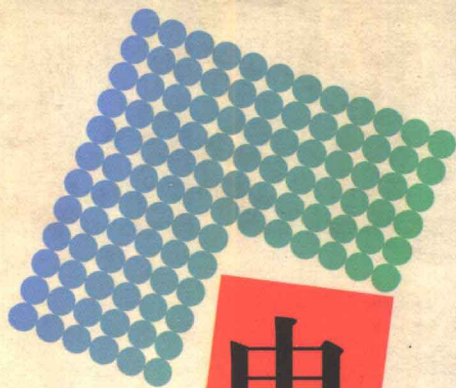




电 视 新 闻

语 言 学

*Dianshixinwen
Yuyanxue*

黄匡宇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视新闻语言学

黄匡宇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新闻语言学/黄匡宇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6

ISBN 7-5043-3512-6

I. 电… II. 黄… III. 电视新闻-新闻语言-语言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531 号

电视新闻语言学

作 者:	黄匡宇
责任编辑:	牟国栋
装帧设计:	张一山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海洋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 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3512-6/G·1355
定 价:	2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一

语言学百花园里 一朵绚丽的新花

——读黄匡宇《电视新闻语言学》

詹伯慧

—

语言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当今社会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不可缺少的手段。研究语言的人深明这个道理，不研究语言的人也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古往今来，多少伟大的思想，多少重要的发明，莫不通过语言这一载体记录下来，传播开去，使那些显示人类智慧、标志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能够代代相传，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几千年前就开始有人研究语言。语言学史告诉我们，中国人研究语言，传统上只专注于语言本身的特点。历史上所谓的“小学”在文字研究、音韵研究和训诂研究诸领域中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传统，取得了显著的业绩，构成了传统语言学的三大支柱，支撑着中国语言学这座

充满东方古典色彩的大舞台。

进入 20 世纪，古老的华夏文化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西学东渐”之风的劲吹，中国的语言研究也开始注入了现代语言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突破了传统“小学”的藩篱——从只是目治的研究古典文献中的语文现象转而同时兼顾目治的和耳治的语文现象。语文学从主要为“经学服务”的“小学”向前大大跨越了一步。有人说这是从 Philology（语文学、语源学）向 Linguistics（语言学）的飞跃。打从《马氏文通》（1898）出版以来，一百年间中国语言学同时沿着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两个方向迅速发展，到了近几十年，随着语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充，特别是音声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更给中国语言学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语言学面临着大量新的课题，如何跳出传统语言学狭窄的天地，把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语言理论和语言应用密切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语言学发展新的动力、新的目标。如今，中国语言学界不但有了中国语言学会及其下位的中国音韵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训诂学会、中国方言学会、中国修辞学会等等，而且也有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和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等新的语言学术团体，语言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种内涵日益加宽的趋势，标志着语言科学跟社会结合的层面不断扩展，表明中国语言学界正在努力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贴近社会发展的脉搏。

中国语言学既然发展到了和现代化和社会应用紧紧相连的地步，从事语言专业的人，总不能只埋头于语言内在规律的探讨，埋头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对于社会上千百万民众的语言生活，对于语言学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你怎能视而无睹，听而无闻呢！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质朴的感受，笔者打从 80 年代改革大潮兴起以来，对于语言的社会应用问题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工作中，常常关注新时期社会语言生活出现的种种问题。如语言规范问题、语言应用的多元化问题、共同语的推广与方言的使用问题、大众传媒的语言应用问题、语言在信息科学中的作用问题、乃至广告语言的特色问题等等，都深感兴趣。这些年来，我常常鼓励我的研究生走出校门，多了解社会上语言应用的情况，把自己的业务跟社会语言生活紧紧相连，从社会语言生活中吸取专业研究所需的素材和养料，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

二

说来也巧，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近十多年来，高等学校不少从事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转而加入到新闻学科的建设中来，我国大学中的新闻传播系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一下子就从原先仅有的三几家发展到几十家，有的还后来居上，成立起新闻传播学院来。当年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过的学生，有几位竟当起新闻学院的院长、主任来。在新闻传播学这门充满时代气息的学科中，毫无疑问，语言的实践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新闻从业人员如果语言不能过关或是语言只是勉强过关，不能熟练地驾驭在社会发展中瞬息万变的语言，那就很难称得上是一位上乘的新闻工作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先从事语言文学工作的人，比较容易转而投身到新闻专业中来的缘故。但新闻中的语言毕竟有它自身的特色和规律，在新闻传播中，用于报刊的以目治为主的语言跟用于广播、电视中的以耳治为主的语言又各有它的特点。因此，对于从事新闻传播教学研究的人来说，如何立足于新闻传播专业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通过一系列的探讨研究，建立起既属于新闻学，又属于语言学的独

特学科——新闻语言学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建设。作为语言学中的独特分支，新闻语言学所接触到的问题，必然会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不能设想：新闻语言，如广播电视语言的研究，其内容只是简单地收集新闻语言中的各种问题来一一加以评析，就像时下有的地方报纸定时开辟“评报栏”，让读者给该报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语言文学问题进行评析一样。作为一门科学，必不可少的是建立起这门学科的科学体系来。这个体系是否完善妥帖，就得看它能否很好反映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本身具有的特点，同时也得顾及这门学科的“左邻右舍”，把它跟相关学科的关系弄清楚。在建立这门学科的过程中，既要充分阐明本学科的宗旨和内涵，也要反复论证本学科的研究方法；既要回顾本学科产生的根据和背景；也要展示本学科产生发展的过程。只有这样，一门日趋成熟的新兴学科，才能够聚拢起一批有志于此的专业学者，或就本学科统揽全局地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或就本学科中某个方向、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学术条件，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没有一批矢志不移地为学科建设努力拼搏的学者，也就谈不上学科的发展了。

三

暨南大学新闻系在学校里是个不算大的系，但它有较长的历史和传统，曾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培养过不少英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暨大新闻系对广东新闻学科的建设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年来，这个系为数不多的教师们为把专业建设好，更是兢兢业业，潜心研究，勤奋耕作，多年来他们撰写了不少在新闻传播学界具有影响的著作和教材。现

在大家看到的这部《电视新闻语言学》，便是其中精彩的一部。作者黄匡宇同志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中年学者，他胸怀建设电视新闻学的大志，在新闻图像研究与传播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学科研成果。近十多年来，他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先后出版了在新闻传播学界颇具影响的《电视新闻学》（1990）和《理论电视新闻学》（1996），近期又进一步把眼光射向电视新闻传播中最重要的一环——电视新闻语言上来，以其敏锐的触觉，开阔的视野和多年来丰富的业务积累及深厚的研究功力，一气呵成地写出了这本内容充实、立论透辟、多有创意的《电视新闻语言学》。我跟语言科学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对电视新闻学是个门外汉。此次读了这本别具新意的书，对于书中论及有关语言符号系统在电视新闻中应用的种种论述和剖析，深感作者对语言文字和语言学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最为难得的当然是作者能有的放矢地把语言学上相关的理论引进到电视新闻语言这一特殊领域中来。作者思路开阔而清晰，在这部新著中，一层又一层地在电视新闻与语言的关系中抽丝剥茧，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鲜观念，引发出一章又一章的论述，令读者在“始料不及”中领略到此书在理论上和知识上给人带来的许多享受。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本书的《引论》中为自己写作本书的宗旨定位在“追寻科学的规范”上。读者读完此书，一定会有“此言非虚”的感受。我也非常欣赏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不落俗套的见解，他对于画面和语言关系的精辟论述，对于时间、空间等语言哲学因素与电视新闻传播关系的辩证阐释，对于“画面崇拜”的批评以及他在神经语言学基础上所提出的视听符号“双主体”结构理论，都是十分科学与中肯的。作者下了多年苦功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电视新闻语言学的理论，无疑是

具有开创性的。在此以前，还没有出现过如此详尽地专门论述电视新闻语言的专著。就这一点而言，说本书是具有突破性作用的著作，决不会是过分的。

当今世界每个人每天都在看电视，都在享受电视给带来的宝贵信息和娱乐节目。可是，又能有多少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想到：电视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除了千千万万台前幕后的从业人员在做贡献以外，还有那么一批醉心于电视科学研究的学人，他们默默无闻地在日夜耕耘，在为建立和发展电视学科而尽心尽力，拼搏不已呢！

我在这里写下一点读罢黄匡宇同志《电视新闻语言学》后的感想，不仅是因为我和语言学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也因为我同时是一个每天都看电视，特别是看电视新闻的观众。我是多么希望广大电视新闻从业人员扎扎实实掌握电视新闻语言的特点与规律，为我们制作出既好看又好听而且信息量饱满的新闻节目来。

末了，我想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我对此书的印象：

《电视新闻语言学》，不愧为语言学百花园里一朵绚丽的新花。

作者为暨南大学方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序 二

读书与批评

朱光烈

我认识黄匡宇先生是在 1996 年秋天的广州，当时我正在参加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位朋友告诉我，暨南大学有位黄匡宇教授，很有个性，很有见解，问我想不想见见他，我欣然表示同意。于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咖啡厅里见了面。黄先生一说起话来眼睛就会睁大，显得很亢奋，慷慨陈词，见解独到，果然如同那位先生的介绍。我是山东人，马上就想到这位江西“老表”脾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如果没有后来的交往，大概黄先生也会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不久之后，黄先生给我寄了一篇稿件——《电视新闻：用语言叙述，用画面证实》。电视传播中语言与画面的关系，自从中国有了电视学术研究那天起，就一直是研究者在不断讨论的中心问题。80 年代，电视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电视传播是以画面为主的，1989 年，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言认为，电视传播不是以画面为主的，而是以语言为主的。我的发言虽然离经叛道，但是反响不大。我很执著，第二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一个定论的异议》，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的观点，这篇文章却引来了很多批评，写文章的，研讨会上发言的，都有，

有的发言还很激烈。这些批评都没有接触到我的主要论据，所以我没有马上回应，但是，我却在不断地积累资料，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黄先生的大作提供了上千条电视新闻（包括一些专题片）的分析资料，这些分析表明电视新闻节目关上声音没有一条是可以看得懂的，而不看画面只听声音却都可以听得懂。黄先生认为，电视新闻的叙述是依靠语言完成的，画面主要起到了证实语言叙述的作用。中国的广播电视研究有一种偏向，就是通过调查收集具体资料不够，往往以极少的例证推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显得十分空泛，独木难支，摇摇晃晃。在我研究语言与画面的关系问题过程中，曾经想做一些实证调查分析，但是由于太忙，一直没有做，此刻见到了黄先生的大作自然十分高兴，黄先生的大作很快就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了。于是，已经沉寂下来的关于语言与画面的争鸣重新活跃了起来。

在读者正在打开的这本书里，黄先生还重新梳理了电影到电视的传播形态发展。无声电影完全使用画面传播，后来才有了有声电影，但是，无声电影的这种传播手段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后来的电视传播研究一直产生着或明或暗的影响。在电视界人们普遍认同电视与电影的亲缘关系，却不肯承认广播曾经是电视的前驱；人们可以请电影界的人士前来参加业务活动，却总是把广播界的人士当成外行。我还是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当地农民到干校看电视，就把电视叫做“小电影”。这是十分直观的看法，与学术研究无缘，但是许多电视研究者至今还是持这种观念。就实质而言，电影主要是一个艺术传播工具，而电视却是一个主要是以扩大的人际传播为手段的社会信息传播工具。认识到这种性质的不同，对于摆脱电影研究的影响，找到电视传播的本质特征，从而研究电视传播中语言与画

面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黄先生为了撰写本书进行影视比较研究的时候，翻阅了几十本中外电影美学学术著作，发现除了克拉考尔和李蒸幼的著作外再没有研究语言问题的。即使克拉考尔的著作也只有很小的篇幅研究语言问题，可见以往的研究者普遍忽视影视中的语言问题研究。这显然是一大失误。黄先生的研究最为难得之处是他的认真，下死工夫，很不同于制造“泡沫”甚至于大而化之的研究者们。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泡沫研究”和马虎研究，黄先生当是面无愧色，是个堂堂正正的研究者，这是当下中国电视学术界首先必须解决的品质问题。

电视界的研究还有一个缺陷，是许多人不讲究研究方法，甚至于从来没有想到去研究学术研究的方法，好像论文不管怎样写都可以。1999年黄先生发表了《关于电视新闻语言构成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文章之前引用了两句外国学者的话作为题记，一条是美国学者C·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的话：“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其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一条是德国学者莫里茨·盖格尔的话：“方法比结论更重要。”我以为，在学术泡沫漫天飞的今天，在许多电视研究者还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今天，黄先生引用这两句话为题记是很有意义的。这两句话都强调了方法的重要意义。一切正确的研究结论都是以其正确的研究方法为前提的。现代社会发展太快，电视发展太快，任何研究结论，都有可能随着社会和事业的飞速发展而过时，而先进的观念，特别是灵通的、八面来风的研究方法却为我们不断地开辟着通向学术新境界的大道。这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方法是一种智慧，是很难讲清楚的，是需要用生命的投入去体验的，但是它却是最有意义的。

讲到方法最要紧的莫过于眼界的开阔，思路的活跃。或许

这并不是方法，如果它不是方法，那么它便是一切研究方法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我们的电视研究大都是就电视研究电视，走了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如果仅仅是为操作需要，这种研究一般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用来进行理论研究，则由于参照系太少，很容易走偏。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创造，而创造是多元文化要素的整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的升华。只有多元文化要素才可能给我们众多整合的文化要素，才可能使我们站得比较稳当，才可能使我们不至于看走了眼，才可能给我们足够的启发，才可能有所发现。层次较高的电视研究应当走向广阔的天地，走向边缘，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只有在边缘地带上才有多元的文化要素，才可能有所创造。

学术的发现往往是在司空见惯的理所当然之中。电视传播既有声音又有画面，当然必须“声画结合”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正是一种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当你认真的研究之后，你会发现“声画结合”论只不过是电视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层面甚至于是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认识，当你跳出这个层面，超越这个阶段，峰回路转，当是另一番风光，你会发现它是多么的蹩脚，必须有新的认识予以代替。很多电视研究者苦于没有题目，没有资料，其实很多题目和资料就在你的身边，就在司空见惯的理所当然之中，问题在于善于发现。

学术研究永远应当与怀疑和批评相伴。但是怀疑和批评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进行的，它需要一种境界。进入这个境界的大门的通行证就是真正的读书，而学会真正的读书并非易事。伍尔莱夫人在《我们能从书中获得些什么》一文里说，读书切忌先入为主。如果你先入为主，吹毛求疵，就难于得到最大的裨益。但是你能尽量敞开你的意志去欣赏它，体会它，那么从文章顿挫和情节变化中，你会发现许多微妙的隐喻和潜在的慧

眼，从而把你带入一个卓然自立的境界。但是，当你做了作者的朋友之后，还应当做作者的法官，拿一本书与另一本书做比较。读书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尽量敞开你的胸怀，来容纳作者给你的无数印象，第二步是比较和判断。这第二步比第一步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你需要广泛的阅读，有充分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伍尔莱夫人还强调，更难得的是洞察力和判断力，对你读的书做出判断。

伍尔莱夫人的说法不大符合诞生于 20 世纪的接受美学的发现，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形象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甚至还有认为作者已经死亡，形象完全是读者自己创造的，如此说来先入为主难于排除，不应排除。但是接受美学是针对文学作品讲的，我们这里讲的是阅读学术作品的问题，不能先入为主，必须准确理解原作，但是这样读起书来很不容易，也可能不能完全做到，读者必须尽全力接近原作。在我看来，这样的读书是一种创造。进入了这样的读书境界，我们就学会了写作，学会了学术批评。进入了这样的读书境界，文章就可以高屋建瓴，八面来风，行云流水，不仅具有严肃的科学精神，而且往往浪漫气息弥漫于字里行间，读来妙趣横生，我们可以从大量的经典著作中尽情领略这种气息和风采；“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之类的“党八股”、“洋八股”都难于侵入这样的文章的机体；进入这样的读书境界，才可能进行有效的学术批评。不管是写作还是学术批评，也都是创造；舍此之外的写作和批评，如果也可以叫做写作和批评的话，那只能是不太像样的写作和批评。而这里的关键是首先学会读书。但是，很可惜，在我们电视研究者之中，包括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甚至写了一辈子书的人，很多不会读书，没有进入读书境界，或者先入为主，读了等于

没读；或者没了自我，把自己变成了资料篓子，还是等于没读。因此，写文章和批评争鸣都进入不了应有的状态。

依我看，这样的读书和写作状态，所必需的是人的主观世界里已有的丰富和大致均衡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所组成的生态关系，是一种高度的文化素养，是那种举一反三、四流进达灵通的思维方式，善于宏观把握、洞察本质的特殊能力。这不是“学习”来的，而是“修炼”来的。任何在课堂上和书本里获得的不能引导你进入这种境界的“纯粹”方法都无济于事。

这种境界实际上是生命的个性的展现，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个性。因此，真正的学术研究在不同人之间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结论，于是，学术批评便是学术研究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武器，它可以构成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互补发展。当下许多所谓“学术著作”，胡编乱凑，肆意抄袭，改个书名又是一本书，等等，除了鲜有的吹捧之外，学术批评从来不予光顾这类“著作”（应当光顾的是道德批评）；一个人写的东西能够得到学术批评光荣之至，因为它有学术的含量，有批评的价值，应当向遇到过学术批评的学者们表示祝贺。学术批评的方法是有的，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掌握。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许多争鸣实际上是在不同层次上、不同视角上的不协调对话。学术争鸣要在一个层面上对话。你可以而且往往应当把对话引向不同的层面，但是不能在不理睬到争鸣对象研究层面的情况下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还有的批评者甚至于把对象已经批评过的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重新拿来重复一遍，这种“批评”并不是批评，因为它失去了批评对象，无的放矢；这种“争鸣”也不是争鸣，而是“独白”或议论。究其原因，恐怕还要回到原点，需要从会

不会读书方面检讨一下。

我和黄先生在电视传播语言和画面的关系上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90年代后期我的命题是语言是电视传播的基础，语言不仅是整个电视传播的基础，而且也是电视传播中画面创造和解读的基础。这种阐释比起以前以语言为主的提法更准确些。黄先生提出的是电视传播语言画面双主体观点，而且在文章中还批评了我的观点。但是我们都重视语言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不赞成把画面抬到超越它的实际意义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画面崇拜”（图像崇拜）的种种观念和理论。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黄先生的新作《电视新闻语言学》是很有个性、很有探索精神的著作，是带着作者的体温、气息和汗水的著作，它与时下那些抄袭堆砌、胡乱编造、充斥于书架和塞给学生的所谓学术著作和教材大相径庭，它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电视传播理论的不可多得的、进行批评和争鸣的机会。

2000年3月21日于北京广播学院

作者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原《现代传播》主编。

目 录

序 一 语言学百花园里一朵绚丽的新花 ——读黄匡宇《电视新闻语言学》	詹伯慧
序 二 读书与批评	朱光烈
引 论 电视新闻语言必须追寻科学的规范	(1)
第一章 电影、电视语言解构史论	(6)
第一节 电影的发明和默片语言的形成	(6)
一、爱迪生和卢米埃尔在电影发明期(1832~1895) 的语言建树	(7)
二、乔治·梅里爱和格里菲斯在电影奠基期 (1896~1907)的语言贡献	(14)
三、卓别林在电影无声期(1918~1927) 的语言成就	(18)
第二节 电影默片语言构成的特征	(20)
一、画面语言的纪实性	(21)
二、画面语言的绘画性	(29)
三、画面语言的依赖性	(33)
第三节 声音进入电影的技术背景及美学价值	(36)
一、声音进入电影的技术背景,录音技术的 发展推动着电影的进步	(36)
二、声音进入电影的美学价值	(40)
第四节 电影、电视语言研究的缺省与错位	(57)